

18 世纪清代满文辞书中蒙古语的特征

栗林均¹ 著 阿茹汗² 译

(1. 日本东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日本仙台 9808576; 2. 民族出版社, 北京, 100013)

摘要：“清文鉴”意为“满语辞书”。在 18 世纪的中国清朝相继官修了以“清文鉴”命名的系列满文词典。“清文鉴”包括编纂刊行的年代、所用语言(满语, 蒙古语, 汉语, 藏语, 维吾尔等)数量及种类、收录词条数量以及标记体例等方面不尽相同的诸多词典。本文主要阐明了“清文鉴”的特征及其所收录的蒙古语的特征。

关键词: 18 世纪; 清代; 清文鉴; 蒙古语; 满文; 分类词典

引言

在 18 世纪的中国清朝, 大规模官修的满语词典相继编纂出版。这些词典作以“清文鉴”为名流传于世, 其中所收录的诸多词典的名称皆是“*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满语词典”)这一满文书名的汉译(注 1)。

附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序文的第一本“清文鉴”是以满语解释满语的释义词典。主词条共有 12110 条目, 根据词义分类、排列在天部、时令部、地部等 36 个“部”和 280 个下一“类”中。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在第一本清文鉴的满语主词条和释义中记入蒙古语的译文, 形成了满蒙对照的清文鉴, 于乾隆八年(1743 年)刊行了将其蒙古语全部用满文字母标音的满蒙清文鉴。在乾隆帝的时代, 相继编纂了增加了语言种类和主词条数量的清文鉴。其中包括附有满语、汉语的发音(注音)和释义的满汉清文鉴, 附有满语、蒙古语和汉语注音的满蒙汉三种语言对照的清文鉴, 满语、蒙古语、汉语加上藏语的“四体清文鉴”, 再加上维吾尔语的五种语言对照的“五体清文鉴”等(注 2)。

如上所述, “清文鉴”包含了编撰出版的年代、所用语言的数量及种类、收录词条数量及标记体例均不同的诸多词典。今西(1966)将主要的“御制清文鉴”总结为以下 6 种, 从满语文献学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说明。

- (1) 初次编刊的“御制清文鉴”
- (2) 第二次编刊的“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
- (3) 第三次编刊的《御制增订清文鉴》
- (4) 第四次编刊的《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 (5) 第五次编刊的《御制四体清文鉴》*
- (6) 第六次编辑的《御制五体清文鉴》*

此外，今西（1966:133-134）还提到了“乾隆年刊的满蒙合璧清文鉴”。这篇论文是根据书目的信息来介绍的，之后在实际参阅了京都大学文学部的藏书之后在该论文后记部分进行了补充说明（今西，1966:163）。

本文从蒙古语研究的观点出发，对上述(1)~(6)清文鉴以及“乾隆年刊的满蒙合璧清文鉴”进行考察，探讨其中蒙古语的特征和资料意义上的定位。在上述7种清文鉴中，包含蒙古语的有：附有*标记的第二次编刊的“满蒙合璧清文鉴”、第四次以后的编刊的“三体”“四体”“五体”清文鉴以及“乾隆年刊的满蒙合璧清文鉴”。作为蒙古语的资料，以上述几种清文鉴为中心进行讨论，关于不包含蒙古语的(1)“御制清文鉴”和(3)《御制增订清文鉴》，由于两种清文鉴对其后相继编撰的清文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本文从与其他清文鉴之间的联系这一观点来进行探讨（注3）。

上述七种清文鉴均是御制，即由皇帝命令编写，主词条根据词义分类、排列的分类词典，并且以满语为基础这一点是共通的。

一、“御制清文鉴”

最初刊行的清文鉴，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皇帝所写满语词典)”，并附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序文。未附汉文书名，但“御制清文鉴”作为满语的汉译而广为通行。全文只用满文记载，不包含蒙古语。但作为后续包含蒙古语清文鉴的基础，本文需要确认其构成和形式。

本清文鉴由二十六卷组成。其中“序(sioi)”和“目录(šošohon hacin)”合为一卷、正文共二十卷、满文字母顺序编排的索引作为“总纲(uheri hešen)”共四卷、“后序(amargi sioi)”为一卷。卷首的“序”为康熙帝的御制，“目录”为收录词条分为36部280类的一览表。“后序”(跋)有2篇，在前一“跋”的结尾处列有以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马奇(Maci)为首的12名参修官员的名字，在后一“跋”的结尾处列有以经筵讲官·吏部尚书马尔汉(Margan)为首的56名官员的名字。

本清文鉴中所收录的主词条共有12110条目。所有主词条按照词义分为36部280类，附有满文的注解和从经书等满文译书中摘取的例句。

图1为“御制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1页正面的影印资料。正文中的满文主词条以稍大一些的粗体印刷在词语释义部分的两行中央，其中以细体印刷的释文每页排列有12行。

图1中满文的罗马字转写和逐字翻译如下:

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ujui debtelin.

皇帝 写的 满洲 语的 辞 书 第一 本

abkai šošohon, emu hacin,
duin meyen.

天 的 部 一类 四则

abkai hacin, uju,

天 的 类 第一

abka : umesi den tumen jaka be elbehengge be, abka sembi. sing li bithede,
极其 高 万 物 覆盖 物 天 称之为。《性理》书中,

天: judzi i henduhengge, abka, in yang, sunja feten i tumen jaka be wembume

朱子 曰 “天、阴 阳、 五行 万 物 化

banjibumbi sehebi. luwen ioi bithede, colgoropi tumen jaka be

生” 称之为。《论语》的书上 “崇高 万 物

dergi abka :

damu abka amba, damu yoo teherembi sehebi. 上 天: elbehe be

唯 天 大, 唯 尧 相称 之” 覆盖物

jorime gisurembihede, dergi abka sembi. ši ging ni da ya i yun han

指 称 若, 上 天 称之为。《诗经》的 大雅 云 汉

fiyelen de dergi abka be hargašame tuwaci, tere usiha genggiyen sehebi.

篇 “上 天 仰望 看, 那 星星 闪耀着” 称之为。

在最初的清文鉴中所设立的 36 部 280 类的分类体系, 作为词汇分类的规范在后续编撰的《清文鉴》中得以继承, 并且其中收录的 12110 个主词条在之后的清文鉴中有部分修订、替换, 但大部分还是照原样继承了下来。后续的清文鉴可以说是通过继承本清文鉴中的词汇分类方式和词汇项目并对其进行修订与增订而成。根据春花 (2007), 本清文鉴所采用的词汇分类体系是参照宋太宗敕撰的类书《太平御览》中的分类方式而制定的。

作为本清文鉴的影印资料, 以下内容已公开出版。

- 《御制清文鉴》(微胶卷版), “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 雄松堂, 1966.

其中的缺页有: 第 8 卷卷尾的 3 页(第 38 页、第 39 页、第 40 页)。

- 《御制清文鉴(上)》(阿尔泰语资料集 第 3 辑), 晓星女子大学出版部, 1978.

这是御制序、目录、正文的影印资料。目录和正文前 6 页的主词条中有手写的汉语译文。

- 《御制清文鉴索引(下)》(阿尔泰语资料集 第 4 辑), 晓星女子大学出版部, 1982.

后序(跋)和总纲的影印资料后, 附有成百仁氏韩国语的解题, 以及满文罗马字转写形式的索引。

二、“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

第二部刊行的清文鉴是附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文的满语和蒙古语对照词典。满文书名与最初的清文鉴相同（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蒙古文书名为满文书名的直译，即“qayan-u biči-gsen manju ügen-ü toli bičig（“皇帝所写满语词典”）”。未附汉文书名，如果把满文和蒙古文的书名译成汉文的话，与最初的清文鉴（“御制清文鉴”）相同，但从内容上看，可命名为“御制满蒙文鉴”（或者“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此外，为了与最初的清文鉴相区别，也可命名为“清文合蒙古鉴”“蒙古清文鉴”等（注4）。

所谓满文的书名与最初的清文鉴相同，是如实地呈现着清文鉴特殊的编写方式。总之，本清文鉴将最初的清文鉴中满语的主词条和注解，一字一句地附上了蒙古文的直译，并把译文排列在满文的行间对应的位置。总而言之，这一部清文鉴是在最初的清文鉴的基础上录入“完整的蒙古语译文”而成。

关于编写这部清文鉴的目的和经过，编者序有如下记述。

……“另外，蒙古的书和蒙古语的功益很重要。八旗蒙古人中学习蒙古语和识读蒙古书的人越来越少。如此一来，经历岁月后会造错误，甚至会间断。如若没有了长者、老人，调查辨别起来就会很困难。若不趁这个时机将其弄清楚，将来纠正就变得极为困难了”。圣祖圣明地下旨，“将清文鉴翻译成蒙古文。兼附满文和蒙古文，一侧用满文、另一侧用蒙古文书写。下面的注释也同样如此。经书里的内容全部删掉。若有不懂的微小且重要的词语，像制作满文书一样，向八旗的老人、懂蒙古语的蒙古人们寻问书写。上奏翻译完成的若干页样本，朕教示之。”谨遵令，臣我等谨慎仔细看了御制清文鉴，其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间以人事，五行，四时，无所不包。大而衙属、庙宇、军国、礼乐、则例，小至器用饮食、鸟兽草木，共分为280类，编为21卷。这部清文鉴收录了所有分类，其构思极其深奥、细致。本书不能像翻译普通书一样翻译。即便是一字一词，也应合其意，臣我等所学不足，思路狭窄，所见肤浅，不能规范地译成蒙古文。臣我等向八旗的长者、老人，向觐见的四十九旗的蒙古人，以及五十七旗的喀尔喀蒙古人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人询问翻译了不懂、不能识别的词汇。圣祖教导翻译了臣等闻所未闻的蒙古词汇，从而得以实现。…（2b-5b）

可见，康熙帝不仅注重记录蒙古文的必要性，命令将清文鉴译成蒙古文，同时对其书写形式也给出了具体的指示，如满文和蒙古文并行排列，删除释文中经书的例子等。据说编者一字一句严密地进行了翻译。

图2为“御制满蒙清文鉴”的第1卷正文开头部分的影印资料，与最初的清文鉴（图1）进行对照。满文和蒙古文逐字对应，可以看出省略了注解部分中从经书等译书摘取的例子。

下面是图 2 中对应的满语和蒙古语的罗马字转写和译文(注 5)。

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ujui debtelin.
 qayan-u biči=gšen manju ügen-ü toli bičig, terigün debter.
 皇帝 写的 满洲 语的 辞 书 第一 本

abkai šošohon, emu hacin, duin meyen.
 tngri-yin quriyangyui, basa tobčiy_a keme=müi. nige jüil, dörben anggi.
 天 的 部 (又称刚要) 一 类 四 则

abkai hacin, uju.
 tngri-yin jüil, terigün.
 天 的 类 第一

abka : umesi den tumen jaka be elbehenge be, abka sembi.
 tngri : masi öndür tümen yaγum_a-yi bürkü=gšen-i inu, tngri keme=müi.
 天: 极其 高 万 物 覆盖 物 天 称之为

dergi abka : tumen jaka be elbehe be jorime gisurembihede,
 degedü tngri : tümen yaγum_a-yi bürkü=gšen-i jīya=n kelelče=kü bögesü,
 上 天 : 万 物 覆盖物 指 称 若,

dergi abka sembi. niohon abka : abkai boco be jorime
 degedü tngri keme=müi. köke tngri : tngri-yin öngge-yi jīya=n
 上 天 称之为。 蓝 天 : 天 的 色 指称

如上所述，正文每页 12 行，全卷中每隔一行排列了满文和蒙古文。

这部清文鉴的内容基本上与最初的清文鉴相同，形式上的差异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本书加入了蒙古语翻译编者的序（同时记载了满文和蒙古文）。引用的译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置于康熙四十七年的御制序之后。结尾处列有翻译蒙古语的乾清门二等侍卫拉希（Rasi）为首的 18 名官员的名字。

第二，关于后序（跋），其内容与卷文的归纳方法有关。根据江桥（2001:157-158）和黄明信（1957:6-7），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书共 29 卷，由正编（正文）20 卷、总纲（索引）8 卷、后序（跋）1 卷构成。在最初的清文鉴中，御制序和目录作为 1 卷，而本书并未分出正编（正文）第 1 卷，而是将其置于卷首。只有后序未附蒙古文译文，与最初的清文鉴相同（黄明信，1957:6-7）。另一方面，今西（1966:130-131）指出，京都大学图书馆收藏本共 29 卷，卷数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本相同，序和目录合为 1 卷、正文 20 卷、总纲 8 卷（“满蒙清文鉴”未附后序）。天理大学收藏本（微胶卷版）也与这本完全相同，未附后序。可见，最初的清文鉴的后序 2 编在本书编纂的时候就做了另一种处理，未附蒙古文译文，并从卷数中除去了该部分内容(注 6)。

第三，最初的清文鉴中“总纲（uheri hešen）”的 4 卷，在本书中倍增到了 8 卷。与序、目录、正文相同，“总纲”中所有满文的行间均附加了蒙古文的译文，随着行数、页数的倍增，卷数也有了倍增。

第四,如编者序中所示,本书删除了最初的清文鉴中在注释后附加的从经书等译本中摘取的例子。在原本的满文词条和注解上一字一句地附加了蒙古文的直译,因此本清文鉴的分量应该会倍增,但因删除了摘取的例子,本书的卷数与最初的清文鉴相同,共20卷。

这部清文鉴中的蒙古语作为资料意义上的性质,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这里记载的蒙古文作为18世纪初的书面语,是可确定其记录年代的资料。从这部清文鉴之后编纂的三体、四体、五体的清文鉴来看,多数满文和蒙古文均按照原样继承了先行清文鉴中的主词条。在这一点上,这部清文鉴的蒙古文主词条和注释均可视为编写时首次录入的资料。通常,记录的词形是否是从先前的文献中引用的,区别这种差异在处理口语形的显现等情况上尤为重要。

其次,这部清文鉴是清朝皇帝命令编纂的官修辞书,因此其中记录的蒙古文在字形、正字法、语法等方面都可以看作是清朝官员所规范的书面语。

第三,所收录单词数量的丰富性、多样性值得关注。主词条的总数为12110条目,所有的主题条均标注了蒙古文。作为词典,主词条应基本上是不同的词汇(注7)。就主词条而言,收录如此大量和多种类的蒙古语单词的资料较少,尤其以蒙古语解释蒙古语的词典,在同时期及在此前从未有过。

此外,每个词语和表达均与满文一一正确对应、语义清晰,也是其显著特征。主词条和注释均是按满文的顺序逐字翻译,每个单词和表达的意思均可以参照对应的满文。

纵观本清文鉴中所记录的蒙古语的特征来看,基本上可以认定为遵循“古典式蒙古文书面语”(注8)的规范来记录的。

在蒙古文的字形中,词首的“ᠲ (titim)”、词末的“ᠣ (orkiča)、ᠨ (čačulγ_a)、ᠢ (egsilge)”等字形和辅音字母的词末形“ᠪ (不是ᠪ)”的使用情况接近于现在的内蒙古使用的印刷体(参照图2)。出现在元音字母之前的辅音字母<n>和<y>使用带点的字形“ᠨᠠ、ᠨᠢ、ᠨᠣ、ᠨᠤ、ᠨᠥ、ᠨᠦ、ᠨᠦ”等现象和区别辅音字母<č>和<j>的词中形“ᠴ”和“ᠵ”的形式都与现在的内蒙古使用的印刷体相同(注9)。

另外,与现在的内蒙古使用的印刷体不同的是,辅音字母<y>的词首形和词中形使用前端没有钩形的“ᠶ”形,辅音字母<p>使用的不是“ᠮ”形,而是使用“ᠮ”形。辅音字母<s>的词末形使用“ᠰ”和“ᠰ”两种形式等。

虽然与上述内容有部分重叠,但仍对本清文鉴中蒙古文的字形、正书法、词形的显著特点列举如下(注10)。

(1) 作为辅音字母<s>的词末形,单音节词中使用“ᠰ”形,多音节词中使用“ᠰ”形。

单音节词:ᠰᠠᠰ(qas “玉” 14-73b8)、ᠰᠢᠰ(jes “铜” 14-75b8)、ᠰᠢᠰᠤ(bös “布” 15-9a10)、

ᠰᠢᠰᠤ(bars “虎” 19-102b12)等。

多音节词:ᠰᠢᠰᠢᠰᠢ(qayaṣ “半” 2-14b4)、ᠰᠤᠯᠤᠰ(ulus “国” 13-28a8)、ᠰᠡᠴᠦᠰ(ečüṣ “末尾” 17-47a12)、

ᠰᠢᠳᠠᠳᠠ(tenggiṣ “湖” 1-78b8)、ᠰᠢᠮᠢᠰ(jimiṣ “果子” 18-112b8)等。

这种字形的区分是本清文鉴所独有的特征,此后的清文鉴中,辅音字母<s>的词末形全部使用了“ᠰ”的形式。

(2) 在一些词中辅音字母<d>的词首形使用“ᠳ”形。

例:ᠳᠠᠯ(Döl “山险微平处” 1-67a2)、ᠳᠡᠯ(De1 “脖鬃” 20-22a8)、

也就是说，满语“weihe”有“齿”和“角”两种意思，蒙古语的说明对其进行了逐字翻译。

再举一个例子。下面是与满语“da”相对应的说明(2-40a)，蒙古语的主词条是“uy”，词语的解释中加入了“alda”“sumu”两个词的说明。如下：

uy : kereg-ün egüskel-i, uy keme=müi. basa aliba ündüsü eki-yi, mön uy keme=müi.

事 的 开始(宾格) uy 称之为。另 一些 根 元(宾格)，也 uy 称之为。

basa qoyar yar sungya=ju nigente kemne=gsen-i inu, nige alda keme=müi.

另 双 手 伸出 一次 测量 物 一 alda 称之为。

basa jebe sumun-u jerge-yin yayuman-u nigen-i, nige sumu, qoyar-i, qoyar sumu

又、矢 等(属格)东西(属格)一(宾格)，一 sumu、二(宾格)、二 sumu

keme=n kelelče=müi.

称之为。

原来的满语“da”有“①源，根源②寻③(箭)一支”等3种意义，将其按蒙古语进行了逐字翻译。如果将它作为蒙古语的解析词典的话，需要分开处理不同的释义。

第二，关于“总纲”的形式。“总纲”是所有满语单词按照字母顺序编排并表示分类项目的索引，并附有蒙古文的直译。但由于蒙古文未按字母顺序排列，故不能作为蒙古语的索引来使用。

图3为总纲第1卷第2页反面的影印资料。满文的单词按照“alimbi, ajabumbi, afabumbi, …”字母顺序排列，分别表示了正文中所收录的分类项目。满文右侧的蒙古文“dayaya=mui, edü=müi, tusiyalya=mui, …”是按满文进行逐字翻译的。要想从总纲中找出蒙古语的单词，只能根据其对应的满语进行查找。

作为本清文鉴的影印资料，以下内容已公开出版：

- 《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微胶卷版)，“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雄松堂，1966.

其中第10卷中60a-67a的13页被白纸覆盖，此外还有以下缺页和错页。

缺页：第14卷19丁(19a-19b) 错页：第18卷中的73页和76页出现错页

此外，《二十一卷本词典》(内蒙古语文学历史研究所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中从本清文鉴中提取了蒙古语主词条和注解，按蒙古语字母顺序编排，但拼写形式改为了现代规范的正字法形式，并省略了部分注解。具体来说，与位格附加成分“ ᠳᠦᠷ (-dur/-dür), ᠲᠦᠷ (-tur/-tür)”改写为“ ᠳᠦ (-du/-dü), ᠲᠦ (-tu/-tü)”，人称领属的附加成分“ ᠶᠢᠨ (inu)”在阳性词的后面改写为“ ᠶᠢᠨ (anu)”。另外，如上述像“sidü(牙齿)”这样的同音异义词，删除了第二项以后的语义说明。

三、乾隆年刊“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

附有乾隆八年(1743年)序文的本清文鉴原样继承了附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文的清文鉴中的满文，并把所有蒙古文用满文字母进行了转写。在本清文鉴的御制序中，编写目的有以下记载：

……蒙古文虽然有字母笔画，但没有圈点，对于不懂蒙古语的人来说很难识读，初学者不能辨别

其字体进行连读。现今，八旗的蒙古人中老人很少。如若现在不使之明确，时间一长，日后会出现更多的差错，无法得到真正的语音。相互模仿和学习错误的东西，后人在学习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因此特命令大臣诸官将满蒙语词典（满蒙清文鉴）中的蒙古语全部用满文字母书写，重新刻版，使之易懂易读。(2a-3a)

总之，蒙古字母的读法具有模糊性，如果不懂蒙古语的话，无法识读，因此用读法上不存在模糊性的满文字母来标记蒙古语读音的话，可以使蒙古语变得易懂。

为忠实地体现编写目的，本清文鉴按照原样收录了附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文的清文鉴中的满文，也未更改蒙古语的语句，只是将其中的蒙古文转写成了满文字母。因此，两者在正文的内容、页码、页内的行配置、每行的字数都完全相同。图4是与图2相对应的页面(正文第1卷第1页正面)，两者的行数和词的排列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有蒙古语的标记从蒙古字母变成了满文字母。若将图4中排列在偶数行中的蒙古文按照满文的罗马字转写方式来标记的话，如下所示：

hagan nu biciksen manju monggol ugen nu toli bicik, terigun debter.
 皇帝 写的 满洲 蒙古 语 的 辞 书 第一 本

tenggeri yen hūriyanggūi, basa tobciya kememui. nige juil, derben anggi.

天 的 部 (又称刚要) 一 类 四 则

tenggeri yen juil, terigun,

天 的 类 第一

tenggeri : masi ūndur tumen yagūma gi burkuksen ni inu, tenggeri kememui.

天: 极其高万物覆盖物天称之为。

degedu tenggeri : tumen yagūma gi burkuksen ni jigan kelelceku bugesu,

上天: 万物覆盖物指称若,

degedu tenggeri kememui. **kuke tenggeri** : tenggeri yen ūngge gi jigan

上天称之为。蓝天: 天的色指称

另一方面，两本清文鉴之间，有以下形式上的差异：

第一，本清文鉴的书名，满文为“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皇帝所写满语、蒙古语词典）”，其中加入了附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文的清文鉴中没有的“monggo（蒙古）”一词。蒙古文书名为“hagan nu biciksen manju monggol ugen nu toli bicik”，是满文书名的直译。未附汉文的书名(注11)。

第二，本清文鉴新增了乾隆八年（1743年）的御制序和本清文鉴的编者序。正文20卷之前，有序和目录组成的1卷，其内容包括康熙四十七年的御制序、本书的御制序、康熙五十六年的编者序、本书的编者序及目录。

第三，本清文鉴未附总纲和后序。因此，整体由序和目录组成的 1 卷和正文 20 卷构成，合计为 21 卷。根据春花 (2006:594)，本清文鉴的总纲是永璜等补编而成的《御制满蒙文鉴总纲》，于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 刊行。与附有康熙五十六年 (1717 年) 序文的清文鉴的总纲不同，以满文字母转写的蒙古语单词是按照满文字母顺序 (十二字头顺序) 编排的。但是，这个总纲是在本清文鉴刊行 30 多年后编纂的，故将其看作另一本书更为合适 (注 12)。

作为本清文鉴的蒙古语资料的价值在于，蒙古文由满文字母转写而成，从而可以得到蒙古文字母中所无法得到的信息。具体来说，蒙古文的辅音字母 <t> 和 <d>、辅音字母 <x> 和 <g>、词首的辅音字母 <y> 和 <j>、词首以外的元音字母 <a> 和 <e> 均以同一个字形书写，而在满文字母中分别以不同的字形书写，因此可以了解这些字母的发音 (读法)。通过发音 (读法) 中模糊性较少的满文字母来标记蒙古文，可以了解到 18 世纪中期蒙古语语音的重要信息，但是需要了解用满文字母标记蒙古语的相关性质及其限制。

首先，蒙古语的转写标记应在满文字母的体系中，按照满文的正字法规则标记，满语中不存在的音，可以由任意一个与之接近的满文字母来标记。因此，蒙古语中有些音的差异，由于满文字母及其正字法中无法区分，所以在书写上出现不加以区别的现象。例如，蒙古语的元音根据满文的 6 个元音字母进行标记，在判断这个是直接反映了当时的蒙古语音体系之前，值得考虑进行标记时是否受限于满文只有 6 个元音字母的因素。另外，在当时的蒙古语中，即使有短元音与长元音的对立 (特别需要考虑) 现象，但在满文的正字法中，区分这些现象的手段也是极其有限的 (注 13)。因满文字母存在标记手段上的限制，所以需要考虑无法表现蒙古语的短元音和长元音之间差异的可能性。

其次，有必要研究用满文字母标记的蒙古语的本质。这可能并不是想要直接记录当时的“口语发音”。在蒙古文书面语中，现代蒙古语的长元音多用“元音字母+辅音字母 <y, g>+元音字母”的形式，与 <y, g> 相对应的辅音，在八思巴文字和汉字记载的 13~14 世纪的口语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 18 世纪的文献中有满文的辅音字母 <g> 的记载。因此，标记蒙古语的满文字母，在多数情况下，是与蒙古语字母逐字对应，并不表示口语的语音，将其认为与蒙古文书面语的拼写形式相对应的读法较为妥当。

从标记蒙古语的满文字母和蒙古文字母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观点出发，本清文鉴中用满文字母标记蒙古语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 如上所述，在蒙古文字母中无法在字形上区分的辅音字母 <t> 和 <d>、辅音字母 <x> 和 <g>、词首的辅音字母 <y> 和 <j>、词首以外的元音字母 <a> 和 <e>，在满文字母中可用不同的字母加以区分。例 (右侧是蒙古文书面语)：

ᠠᠯᠲᠤ (alta “金” 14-71b12) — ᠠᠯᠲᠠ (alta)、ᠠᠯᠳᠠ (alda “度” 16-43a10) — ᠠᠯᠳᠠ (alda)、
ᠬᠡᠷᠡᠭ (kerek “事” 2-39a4) — ᠬᠡᠷᠡᠭ (kereg)、ᠭᠡᠷᠡᠯ (gerel “光” 1-2b10) — ᠭᠡᠷᠡᠯ (gerel)、
ᠶᠠᠰᠤ (yasu “骨” 3-28b12) — ᠶᠠᠰᠤ (yasu)、ᠵᠠᠰᠠᠬ (jasak “政” 2-31b10) — ᠵᠠᠰᠠᠶ (jasay)、
ᠨᠠᠷᠠᠨ (naran “日” 1-2b8) — ᠨᠠᠷᠠᠨ (naran)、ᠨᠡᠷᠡ (nere “名” 7-26a12) — ᠨᠡᠷᠡ (ner_e)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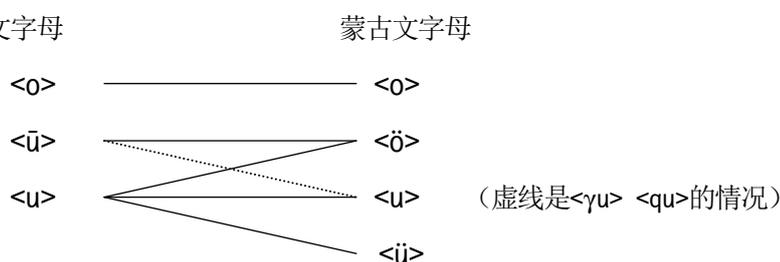
(2) 满文的辅音字母 <h> 对应于蒙古文的辅音字母 <q>，满文的辅音字母 <k> 对应于蒙古文的辅音字母 <k>。例 (右侧是蒙古文书面语)：

ᡥᡠᡵᡠᠨ (hagan “君” 2-1b8) — ᡤᡠᡵᡠᠨ (qayan)、ᡥᡠᡳᡵᡠᠨ (hota “城” 13-29a2) — ᡤᡠᡳᡵᡠᠨ (qota)、
ᡥᡠᡵᡠᠯᡠ (hūral “集处” 3-4b12) — ᡤᡠᡳᡵᡠᠯᡠ (qural)、ᡠᡥᡠᡵᡠᠨ (aha “兄” 5-19a6) — ᡠᡥᡠᡵᡠᠨ (aq_a)、
ᡠᡥᡠᡵᡠᠯᡠ (cihūla “重要” 2-39a12) — ᡠᡥᡠᡵᡠᠯᡠ (čiquila)、ᡤᡠᠨ (ken “谁” 12-41b12) — ᡤᡠᠨ (ken)、
ᡤᡠᡵᡠᡳᡵᡠᠨ (kuke “蓝” 1-1a12) — ᡤᡠᡵᡠᡳᡵᡠᠨ (köke)、ᡠᡥᡠᡵᡠᠨ (nūkur “夫” 5-18b6) — ᡠᡥᡠᡵᡠᠨ (nökür)等。

(3) 满文的3个元音字母<o><u><ü>对应于蒙古文的4个元音字母<o><u><ö><ü>, 其对应关系可作以下归纳(注14):

- 满文字母<o>大多数情况下对应于蒙古文字母<o>。
- 满文字母<ü>大多数情况下对应于蒙古文字母<ö>、以及<γu><qu>的<u>。
- 满文字母<u>对应于蒙古文字母<ü><ö>、以及<γu><qu>以外的<u>。

对应关系如图所示:



这些是根据大量的语料总结归纳的对应关系, 此外也存在为数不多的其他类型的对应情况。

(4) 满文字母“ᡤᡠᡵᡠᠨ <k>”和“ᡤᡠᡵᡠᠨ <k>”对应于蒙古文音节末尾和词末的辅音字母“<γ> (ᡤ ᡠᠨ)”和“<g> (ᡤ ᡤ)”。例如:

ᡠᡤᡠᡳᡵᡠᠨ (akta “骗” 4-98a10) — ᡠᡤᡠᡳᡵᡠᠨ (ayta)、ᡠᡤᡠᡳᡵᡠᠨ (bokda “圣” 2-2b8) — ᡠᡤᡠᡳᡵᡠᠨ (boyda)、
ᡠᡤᡠᡳᡵᡠᠨ (nutuk “籍贯” 13-32a12) — ᡠᡤᡠᡳᡵᡠᠨ (nutuy)、ᡠᡤᡠᡳᡵᡠᠨ (juk “方向” 1-95a4) — ᡠᡤᡠᡳᡵᡠᠨ (jüg)、
ᡠᡤᡠᡳᡵᡠᠨ (ukyu “绿松石” 14-74b12) — ᡠᡤᡠᡳᡵᡠᠨ (ogyu)、ᡠᡤᡠᡳᡵᡠᠨ (cigik “潮” 12-31a2) — ᡠᡤᡠᡳᡵᡠᠨ (čigig)、
ᡠᡤᡠᡳᡵᡠᠨ (kukjimui “火旺” 14-83a2) — ᡠᡤᡠᡳᡵᡠᠨ (kögji=müi)等。

(5) 附加于名词的格助词附加成分, 大多数可对应于蒙古文书面语的格助词附加成分, 也出现了具有独特读音的现象, 如属格附加成分和宾格附加成分。没有根据元音和谐规律进行语音交替的形式, 应该是在强调附加成分作为独立单位(词)的读法。下面, 举例说明格助词附加成分的形式(注15)。

属格附加成分

- ᡤᡠᠨ (yen): 用在以元音字母结尾的词干后。没有根据元音和谐规律进行语音交替的形式。
ᡤᡠᠨ (tenggeri yen “天的” 1-1a12)、ᡤᡠᠨ (ayungga yen “雷的” 1-12b2)、
ᡤᡠᠨ (beye yen “身体的” 1-28b4)、ᡤᡠᠨ (margata yen “明天的” 1-43a4)、
ᡤᡠᠨ (udesi yen “晚上的” 1-44a10)等。
- ᡤᡠᠨ (nu): 用在以辅音字母“ᡤᡠᠨ”结尾的词干后。
ᡤᡠᠨ (naran nu “日的” 1-3a8)、ᡤᡠᠨ (saran nu “月的” 1-3b4)、
ᡤᡠᠨ (odon nu “星的” 1-7a6)、ᡤᡠᠨ (egulen nu “云的” 1-12b12)、

ᠠᠭᠤᠯᠠᠨ ᠨᠤ (agūlan nu “山的” 1-65b2)、ᠬᠤᠮᠤᠨ ᠨᠤ (kumun nu “人的” 1-3a2)、
ᠬᠤᠪᠦᠭᠦᠨ ᠨᠤ (kubegun nu “子的” 5-21a4)等。

• ᠭᠦᠨ (gun): 用在以辅音字母“ᠨ <ng>”结尾的词干后。

ᠲᠠᠷᠢᠶᠠᠯᠠᠭ ᠭᠦᠨ (tariyalang gun “田地的” 1-81a2)、ᠵᠣᠪᠠᠯᠠᠭ ᠭᠦᠨ (jobalang gun “忧患的” 3-27a2)、
ᠣᠯᠤᠭ ᠭᠦᠨ (olong gun “肚带的” 4-99b4)、ᠬᠤᠷᠢᠶᠡᠯᠡᠭ ᠭᠦᠨ (kuriyeleng gun “园的” 5-7b4)、
ᠬᠤᠪᠦᠭ ᠭᠦᠨ (kubung gun “棉花的” 15-9a10)等。

• ᠤᠨ (un): 用在除“ᠨ <n>”“ᠨ <ng>”以外的辅音字母结尾的词干后。与词干连写。

ᠶᠠᠪᠤᠳᠠᠯ ᠤᠨ (yabudal un “行为”) — ᠶᠠᠪᠤᠳᠠᠯᠤᠨ (yabudalun “行为的” 6-50a8)、
ᠪᠢᠴᠢᠬ ᠤᠨ (bicik un “书”) — ᠪᠢᠴᠢᠭᠤᠨ (bicigun “书的” 2-19a12)、
ᠭᠠᠵᠠᠷ ᠤᠨ (gajar un “地”) — ᠭᠠᠵᠠᠷᠤᠨ (gajarun “地的” 1-6b12)等。

与位格附加成分

• ᠲᠤᠷ (tur): 用在以辅音字母“ᠬ <k>”“ᠬ <k>”“ᠲ <t>”“ᠰ <s>”“ᠷ <r>”“ᠪ ”结尾的词干后。

ᠪᠢᠴᠢᠬ ᠲᠤᠷ (bicik tur “书上” 12-57a10)、ᠴᠠᠬ ᠲᠤᠷ (cak tur “时上” 1-19b6)、
ᠲᠤᠰᠢᠮᠡᠲ ᠲᠤᠷ (tusimet tur “对于众官” 2-10b4)、ᠤᠯᠤᠰ ᠲᠤᠷ (ulus tur “对于国” 2-4a12)、
ᠭᠠᠵᠠᠷ ᠲᠤᠷ (gajar tur “地上” 1-2b10)、ᠬᠡᠪ ᠲᠤᠷ (keb tur “银模子上” 13-24a4)等。

• ᠳᠤᠷ (dur): 用在以元音字母以及辅音字母“ᠬ <l>”“ᠮ <m>”“ᠨ <n>”“ᠨ <ng>”结尾的词干后。

ᠬᠠᠳᠠ ᠳᠤᠷ (hada dur “峰上” 1-72a8)、ᠬᠡᠭᠡᠷᠡ ᠳᠤᠷ (kegere dur “野上” 1-56a12)、
ᠳᠠᠯᠠᠢ ᠳᠤᠷ (dalai dur “海上” 3-102a8)、ᠡᠷᠡᠭᠡ ᠳᠤᠷ (erego dur “下颏上” 5-59b4)、
ᠨᠢᠳᠤᠨ ᠳᠤᠷ (nidun dur “眼睛里” 1-2b12)、ᠭᠡᠷᠡᠯ ᠳᠤᠷ (gereᠯ dur “光下” 1-3a6)、
ᠭᠠᠩ ᠳᠤᠷ (gang dur “旱下” 1-37b2)、ᠵᠠᠮ ᠳᠤᠷ (jam dur “路上” 2-16a8)等。

宾格附加成分

• ᠭᠢ (gi): 用在以元音字母以及辅音字母“ᠬ <k>”“ᠬ <k>”“ᠨ <ng>”结尾的词干后。

ᠶᠠᠭᠤᠮᠠ ᠭᠢ (yagūma gi “把物件” 1-1a8)、ᠡᠬᠡ ᠭᠢ (eke gi “把母” 2-6b2)、
ᠨᠡᠷᠡ ᠭᠢ (nere gi “把名” 3-58a4)、ᠠᠬᠤᠢ ᠭᠢ (ahūi gi “把所有” 1-97b10)、
ᠰᠢᠷᠣᠢ ᠭᠢ (siroi gi “把土” 1-27a10)、ᠪᠢᠴᠢᠬ ᠭᠢ (bicik gi “把书” 2-9a2)、
ᠬᠡᠷᠡᠬ ᠭᠢ (kerek gi “把事” 1-28b10)、ᠵᠠᠷᠯᠢᠬ ᠭᠢ (jarlik gi “把旨” 2-2a12)、
ᠵᠠᠭ ᠭᠢ (jang gi “把性” 2-35b4)、ᠭᠠᠰᠠᠯᠠᠭ ᠭᠢ (gasalang gi “把怨” 2-96a8)、
ᠬᠤᠷᠢᠶᠡᠯᠡᠭ ᠭᠢ (kuriyeleng gi “把园” 5-7b4)等。

• ᠨᠢ (ni): 用在以辅音字母“ᠨ <n>”结尾的词干后。

ᠰᠠᠷᠠᠨ ᠨᠢ (saran ni “把月” 1-6a10)、ᠣᠳᠣᠨ ᠨᠢ (odon ni “把星” 1-7b6)、
ᠤᠰᠤᠨ ᠨᠢ (usun ni “把水” 1-14a4)、ᠰᠢᠪᠠᠭᠤᠨ ᠨᠢ (sibagūn ni “把鸟” 1-62b6)、
ᠬᠤᠮᠤᠨ ᠨᠢ (kumun ni “把人” 1-35b8)、ᠴᠢᠯᠠᠭᠤᠨ ᠨᠢ (cilagūn ni “把石” 1-69b2)等。

- ᠠᠨ(i): 用在除“ᠠᠨ <k>” “ᠠᠨᠢ <k>” “ᠠᠨᠭ <ng>” “ᠠᠨᠨ <n>” 以外的辅音字母结尾的词干后。与词干连写。
 ᠭᠣᠯᠠ(gool “河”) — ᠭᠣᠯᠢ(gooli “把河” 1-2b4)、
 ᠭᠠᠵᠠ(gajar “地”) — ᠭᠠᠵᠠᠷᠢ(gajari “把地” 1-2b6)、
 ᠤᠷᠢᠲᠤ(urit “预前”) — ᠤᠷᠢᠳᠢ(uridi “把预前” 1-28b4)、
 ᠵᠠᠮ(jam “路”) — ᠵᠠᠮᠢ(jami “把路” 1-72a4)、
 ᠤᠯᠤᠰ(ulus “国”) — ᠤᠯᠤᠰᠢ(ulusi “把国” 2-1b8)、
 ᠲᠤᠯᠤᠪ(tulub “模样”) — ᠲᠤᠯᠤᠪᠢ(tulubi “把模样” 1-20b6)等。

从比格附加成分

- ᠡᠴᠡ(ece): 可用在所有的词干后。没有根据元音和谐规律进行语音交替的形式。
 ᠵᠢᠮᠢᠰᠡᠴᠡ(jimis ece “从果子” 19-43a10)、ᠴᠢᠴᠢᠬᠡᠴᠡ(cicik ece “从花” 19-49b8)、
 ᠰᠠᠷᠠᠡᠴᠡ(sara ece “从月亮” 1-35a6)、ᠵᠠᠪᠰᠠᠷᠡᠴᠡ(jabsar ece “从缝隙” 1-4a10)、
 ᠭᠠᠵᠠᠷᠡᠴᠡ(gajar ece “从地” 1-9a4)等。

凭借格附加成分

- ᠪᠡᠷ(ber): 用在以元音字母结尾的词干后。没有根据元音和谐规律进行语音交替的形式。
 ᠨᠢᠳᠦᠷᠭᠠᠪᠡᠷ(nidurga ber “用拳” 2-66b2)、ᠰᠢᠳᠦᠪᠡᠷ(sidu ber “用牙” 5-73b10)、
 ᠲᠣᠯᠦᠭᠠᠢᠪᠡᠷ(tologai ber “用头” 2-70b6)、ᠤᠭᠡᠪᠡᠷ(uge ber “用言” 2-94a2)、
 ᠰᠠᠪᠬᠠᠪᠡᠷ(sabha ber “用筋” 3-18a10)等。
 这个附加成分也可以连写于词干后，例如“ᠨᠢᠳᠦᠪᠡᠷ(niduber “用眼睛” 1-2b6)”。

- ᠶᠡᠷ(iyer): 接在以辅音字母结尾的词干后。没有根据元音和谐规律进行语音交替的形式。
 ᠰᠢᠨᠡᠲᠢᠶᠡᠷ(sinet iyer “在初旬” 1-38b10)、ᠴᠠᠬᠢᠶᠡᠷ(cak iyer “用时间” 1-45b2)、
 ᠬᠠᠭᠦᠴᠢᠲᠢᠶᠡᠷ(hagücit iyer “在下旬” 1-39a2)、ᠭᠠᠵᠠᠷᠢᠶᠡᠷ(gajar iyer “用土地” 1-63b10)、
 ᠬᠤᠴᠤᠨᠶᠡᠷ(kucun iyer “用力” 1-87a2)等。

联合格附加成分

本文中只出现2例“ᠬᠤᠮᠤᠨᠯᠦᠭᠡ”(kumun luge “与人” 2-51a2, 10-14b8)的形式。序文中有“ᠴᠠᠬᠢᠯᠦᠭᠡ”(cak luga “和时间”)的形式，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可以分为“ᠯᠦᠭᠠ”(luga)和“ᠯᠦᠭᠡ”(luge)两种形式。

(6) 蒙古文书面语中一些词的拼写形式出现了部分不对应的标记形式。例如：

- ᠲᠡᠩᠭᠡᠷᠢ(tenggeri “天” 1-1a8) — ᠲᠠᠩᠭᠢᠷᠢ(tngri)、ᠤᠵᠤᠭᠤᠰᠢ(ujuk “字” 3-63a6) — ᠤᠰᠦᠭᠤᠭᠤ(üsüg)、
 ᠳᠡᠷᠪᠡᠨᠠᠳᠤ(derben “四” 3-81a8) — ᠳᠣᠷᠪᠡᠨᠠᠳᠤ(dörben)、ᠳᠡᠴᠢᠨᠠᠳᠤ(decin “四十” 3-83a8) — ᠳᠣᠴᠢᠨᠠᠳᠤ(döčin)、
 ᠶᠢᠰᠦᠨᠠᠳᠤ(isun “九” 3-82b2) — ᠶᠢᠰᠦᠨᠠᠳᠤ(yisün)、ᠶᠢᠷᠡᠨᠠᠳᠤ(iren “九十” 3-83b6) — ᠶᠡᠷᠡᠨᠠᠳᠤ(yeren)、

ᠴᠢᠴᠢᠻ (cicik “花” 19-47a6) — ᠴᠡᠴᠡᠭ (čečeg) 等。

(7) 此外，也可以观察到一些口语的形式，但大体上沿袭了先行满蒙清文鉴中蒙古语的形式（参照本文第二部分的（6））。

ᠬᠠᠵᠠᠭ (hajao “旁” 1-96a2)、ᠨᠡᠮᠤᠢ (neomui “流荡” 10-9a4)、
ᠵᠡᠭ (jeo “针” 14-65b4)、ᠨᠢᠰᠤ ᠨᠢᠮᠤᠢ (nisu nimui “擤鼻涕” 5-85b4)、
ᠳᠡᠭᠦᠷ (degur “浮面” 9-54b4)、ᠴᠠᠳᠤ (cadu “那边” 1-97b2)、ᠲᠣᠭᠣ (togo “锅” 16-11b8)、
ᠪᠤᠮ (bum “块” 1-57b8)、ᠠᠯᠴᠣᠷ (alcor “手巾” 15-61b2)、ᠬᠦᠲᠠᠭᠠ (hūtaga “小刀” 4-64a6)、
ᠨᠦᠷᠦ (nuru “腰” 5-66b10)、ᠵᠤᠲᠦᠬᠤᠮᠤᠢ (jutkumui “拘泥” 12-23b8) 等。

作为本清文鉴的影印资料，以下内容已公开出版。

- 《御制满蒙文鉴》（故宫珍本丛刊 720-721），海南出版社，2001。

四、《御制增订清文鉴》

附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序文的本清文鉴，是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对照词典，是一部具有满文注解并包含满语和汉语语音信息的，具有极多功能的清文鉴。（图 5）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 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皇帝所写增加并规定的满语词典）”。整体由正编 32 卷、正编的总纲 8 卷、补编 4 卷、补编的总纲 2 卷构成。此外，有“御制清文鉴”的序、本书的序、十二字头表各 1 卷。

作为本清文鉴的特征，首先要指出的是，正如本清文鉴的书名所示，对收录词条的数量进行了大幅度“增订”。

词条的总数为 18654 条目，相较于先前的 3 种清文鉴的词条数量 12110 增加了 6544 项，总数约为原来的 1.5 倍。其中，正编（32 卷）的分类体系从 280 类增加到 292 类，词条为 17035 项。补编（4 卷）中收录了 26 类 1619 项。

这个分类体系和所收录词条，在此后的清文鉴，特别《四体清文鉴》及《五体清文鉴》中大体上保持了原样。所收录的词条中只有约 20 个词存在差异。在本清文鉴中未收录，但在《五体清文鉴》中收录的词条有 19 项。与此相反，本清文鉴中收录的 2 项词条在《五体清文鉴》中没有被收录。总体来说，本清文鉴中收录的词条比《五体清文鉴》少了 17 项。除此之外，2 项满语的词条呈现差异。

除了所收录的词汇大幅度增加以外，该清文鉴的另一个特点是标注了满语和汉语译文的发音信息。满语的发音用汉字转写、汉语的发音用满文字母转写来标注的。其中，满语发音的汉字标注方法是根据“三合切音”这一独特的方式来标注的。

图6为本清文鉴中“十二字头”的满语音节表的一部分，表示各音节的满文字母的右侧配置了转写其发音的汉字。图6从左侧按上下排列有

an en in, on un ūn, nan nen nin,
non nun nūn, kan gan han, kon gon hon,
kūn gūn hūn, ban ben bin, bon bun būn,
• • •

上述音节，是最多用3个汉字的组合来表示音节的“三合切音”汉字注音方式。基本上，由一个元音构成的音节用一个汉字注音，由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构成的音节（“辅音+元音”或“元音+辅音”）用两个汉字注音，由两个辅音和一个元音构成的音节（“辅音+元音+辅音”）用三个汉字来注音的方式。

本清文鉴虽不包含蒙古语，但“三合切音”的汉字标注方式被后续刊行的满蒙汉三语对照的《三合切音清文鉴》所继承了下来。

作为本清文鉴的影印资料，以下内容已公开出版。

- 《御制增订清文鉴》（微交卷版），“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雄松堂，1966.

本清文鉴被收录在钦定四库全书（经部十小学类二字书之属）中，可利用其复刻本，如下：

- 《御制增订清文鉴（2册）》“四库全书232,23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御制增订清文鉴（2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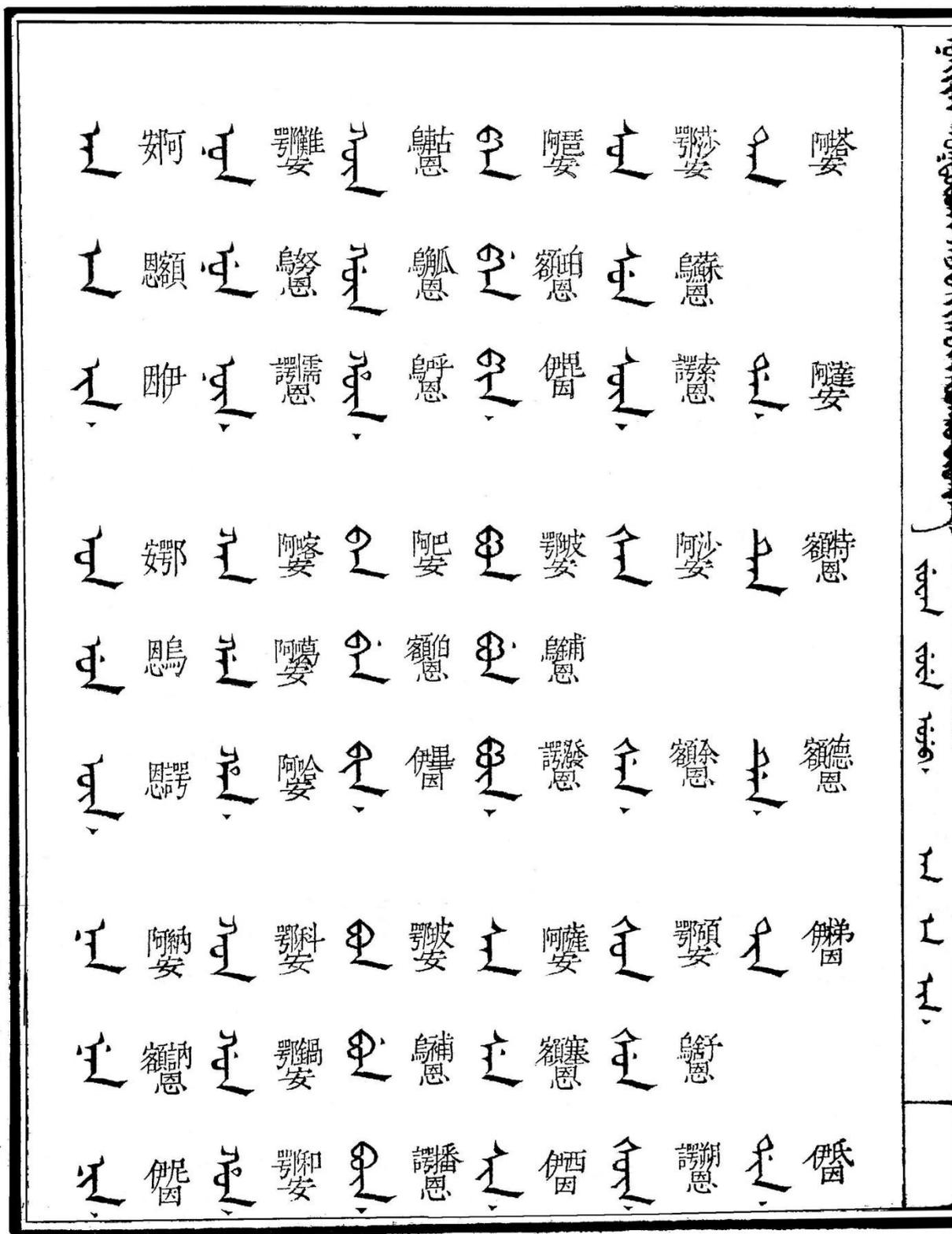
另外，《清代中国语 满洲语辞典》（中嶋幹起编、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1999）是由中嶋（1993-1999）整理的作品，将全部9册总结成1卷共2166页。本书对《御制增订清文鉴》中所收录词条进行了汉语拼音标注、汉字注音、满文注音方式的罗马字转写以及满语词条和注解的罗马字转写，并附加了现代汉语和满语的索引。

五、《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附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序文的本清文鉴的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nikan hergen ilan hacin i mudan acaha buleku bithe（皇帝所写满洲文字、蒙古文字、汉字3种合音词典）”，是满语、蒙古语、汉语3种语言的语音词典。其蒙古文书名为“qayan-u biči=gsen manju mongyul kitad üsüg yurban jüil-ün ayalγu neyile=gsen toli bičig”。

全卷中正文有31卷。另外由序（御制序与御制增订清文鉴的序。均为满、蒙、汉三种语言）、凡例（只有汉语）、编者名、职名表（只有满语）、目录（满、蒙、汉）合成的1卷，共计32卷。未附“总纲”。

图6. 《增订清文鉴》的满文十二字头及三合切音汉字转写（部分）



《增订清文鉴》（“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编”）

图7.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2页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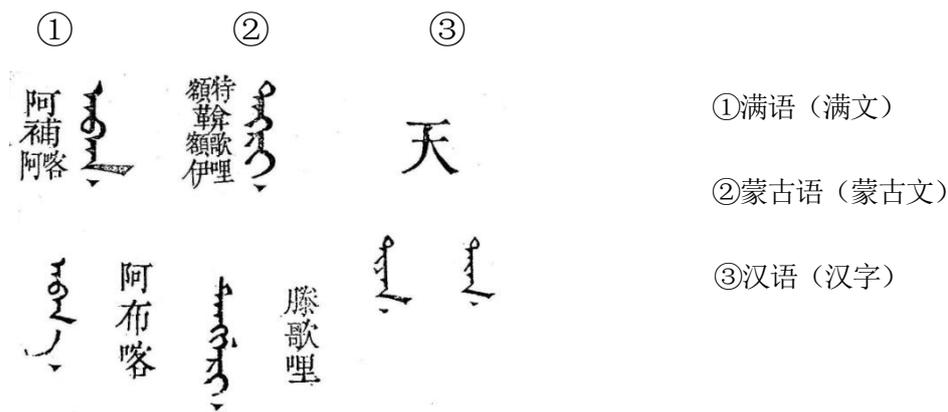
<p>阿補喀 阿喀</p> <p>阿布喀</p>	<p>特幹歌哩 額額伊</p> <p>滕歌哩</p>	<p>天</p>	<p>伊優鄂安</p> <p>阿補喀</p>	<p>枯珂 烏額</p> <p>特幹歌哩 額額伊</p> <p>枯珂滕歌哩</p>	<p>蒼天</p>
<p>德爾基 額呼伊</p> <p>阿補喀</p>	<p>德歌都 額額烏</p> <p>特幹歌哩 額額伊</p> <p>德歌都滕歌哩</p>	<p>上天</p>	<p>歌幹其業 額額伊額恩</p> <p>阿補喀</p> <p>賡音阿布喀</p>	<p>歌歌根 額額額恩</p> <p>特幹歌哩 額額伊</p> <p>歌歌根滕歌哩</p>	<p>清天</p>

天文類

词条共有 13835 条目，相比“满蒙清文鉴”增加了 1725 条目，但比《增订清文鉴》减少了 4819 条目。词条的分类体系有 36 部 289 类，相比“满蒙清文鉴”中的 280 类多，但比《增订清文鉴》的 292 类要少，处于两者之间。

本清文鉴的主要特点是，收录的词条具有丰富的语音信息。

图 7 为本清文鉴正文第 1 卷第 2 页正面的影印资料，下图为第 1 个词条。从左侧开始依次为①满语(满文)②蒙古语(蒙古文)③汉语(汉文)，每个都标注了 2-3 种的发音方式。



①~③每种语言所附加的发音标记如下。

左	① 满 语	左	② 蒙 古 语	③ 汉 语	
左 下	右 下	左 下	右 下	左 下	右 下

①对于满语:

左侧: 用汉字(三合切音方式)转写的发音标记
左下: 用蒙古文字母转写的发音标记
右下: 用汉字转写的发音标记

②对于蒙古语:

左侧: 用汉字(三合切音方式)转写的发音标记
左下: 用满文字母转写的发音标记
右下: 用汉字转写的发音标记

③对于汉语:

左下: 用满文字母转写的发音标记
右下: 用蒙古文字母转写的发音标记

全卷所收录的 13835 条目，均由上述 11 个部分构成。

如上所述，本清文鉴对蒙古语标注了 3 种语音信息，有必要对其性质进行充分的探讨和评价。

首先，从蒙古语的满文字母转写的注音标记来看，本文的第三部分中总结的特征(1-7)与本清文鉴的满文字母转写标记完全一致，可视为本清文鉴沿袭了附有乾隆八年(1743 年)序文的“御制满蒙文鉴”的标注形式。作为本清文鉴中独特的信息，替换和新增加了“御制满蒙文鉴”中未收录的词条。

其次，根据汉字“三合切音”方式标记的语音，把蒙古语的音节分解为“辅音+元音+辅音”形式，

用汉语中没有的音来标注的这一独特方法，呈现了极为精细且严密的语音信息。这让人容易联想到用特殊的汉字组合方式标记的《元朝秘史》《华夷译语》（甲种本）的汉字音译方式。但是，本清文鉴中以汉字“三合切音”转写蒙古语的方式，尽管采用了极其繁杂的标记方法，然而将其与以满文字母转写标注的蒙古语进行比较，可以认为两者所标记的语音信息是等价的。也就是说，以满文字母能够辨别的语音以汉字也能够区别，而以满文字母无法辨别的语音以汉字也无法区别。

尽管汉字和满文字母的标记体系大有不同，但所标记的内容完全相同，该怎么理解这一现象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原始的蒙古语的发音相同，所以即使标记的文字和记载方法不同，其标记内容是相同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有人为地统一了标记内容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根据汉字“三合切音”的转写蒙古语的方式不是直接记录口语发音（或者读音），而是把满文字母的语音标记按照一定的方式替换了汉字“三合切音”方式。这样可以理解两者一致的现象。

从满文字母按一定的方式转换成汉字“三合切音”的转写方式，如图6《增订清文鉴》中所见，是满文十二字头的“三合切音”汉字转写。如上所示，本清文鉴中蒙古语的转写方式沿袭了“御制满蒙文鉴”中以满文字母转写语音的方式。满文字母的转写方式是根据满文十二字头表的三合切音方式进行转换的，即本清文鉴中蒙古语的“汉字三合切音标记”。

为此，我们可以推定本清文鉴中独特的语音转写方式是另一种转换方式（不是三合切音方式）的汉字转写。

作为本清文鉴的影印资料，以下的内容已公开出版。

-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微交卷版），“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雄松堂，1966.

其中有以下错页（注16）：

御制序的11-18页和御制增订清文鉴序的11-19页出现页码调换。

第5卷的第45页和第10卷的第45页出现页码调换。

此外，本清文鉴被收录在钦定四库全书中（经部十小学类二字书之属），可以使用复刻本。

另外，《〈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蒙古语排列对照词汇》（栗林均、呼日勒巴特尔编、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2006）以本清文鉴中蒙古语的罗马字转写为主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在蒙古语的主词条后，按蒙古语的满文字母标记（罗马字转写）、蒙古语（蒙古文）、汉语、满语（罗马字转写）的顺序排列，并附有原文中出现的位置和分类项目以及在《五体清文鉴》中出现的位置。

关于本清文鉴中蒙古语的特征，在该书的“前言”中有所探讨，在这里不再赘述（注17）。另外，呼日勒巴特尔（2004）专门论述了本清文鉴中蒙古语的标记方式和语言的特征。

六、《御制四体清文鉴》

本清文鉴是满语、藏语、蒙古语、汉语四种语言对照词典。是一部殿版本刻本，但出版年代不详。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duin hacin i hergen kamci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皇帝所写包含 4 种文字的满语词典）”，蒙古文书名为“qayan-u biči-gsen dörben jüil-ün üsüg-iyer qabsur=u=γsan manju ügen-ü toli bičig”。未附序和总纲，只有目录和正文。正文包括正篇 32 卷、和补篇 4 卷。词条数目共有 18667 条目，相比《五体清文鉴》少了 4 项。与《增订清文鉴》及《五体清文鉴》同样设为 36 部 292 类。

本清文鉴中未收录，但在《五体清文鉴》中出现的有以下 4 项：

第 9 卷武功部 2 畋猎类 3 的“fenfuliyer tuheke”（“兽中伤口著地倒状”，蒙：türügüle+ber una=bai）

第 16 卷人部 7 疼痛类 2 的“holhon gocimbumbi”（“腿肚转筋”，蒙：šaγantu tata=mui）

第 22 卷产业部打牲器用类 3 的“horhotu”（“打虎豹大木笼”，蒙：qorquγur）

第 31 卷兽部兽类 3 的“šolonggo mafuta”（“两岁鹿”，蒙：šumayai dayir）

正文每行均排列有满语、藏语、蒙古语、汉语（参照图 8）。1 行中列有 1 项（1 项 1 行）的体例与《五体清文鉴》相同，但《五体清文鉴》中的藏语（和维吾尔语）附有满文字母转写的语音信息，而本清文鉴则不包含语音信息。除此之外，词汇项目、分类体系和排列方法均与《五体清文鉴》相同。

本清文鉴作为蒙古语资料的价值在于，附加了藏语译文的同时在词汇数量上相比《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增加了 4836 条目。据今西（1966:144）发现，满文的错误较多，存在未勘校出版的可能。在后述的《五体清文鉴》（北京本、奉天本）中蒙古语的误记也不少，因此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校订之后再利用本清文鉴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对《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中未收录的词汇，在本清文鉴与《五体清文鉴》之间进行比较、对照，是很有价值的。

作为本清文鉴的影印资料，以下微胶卷版资料已公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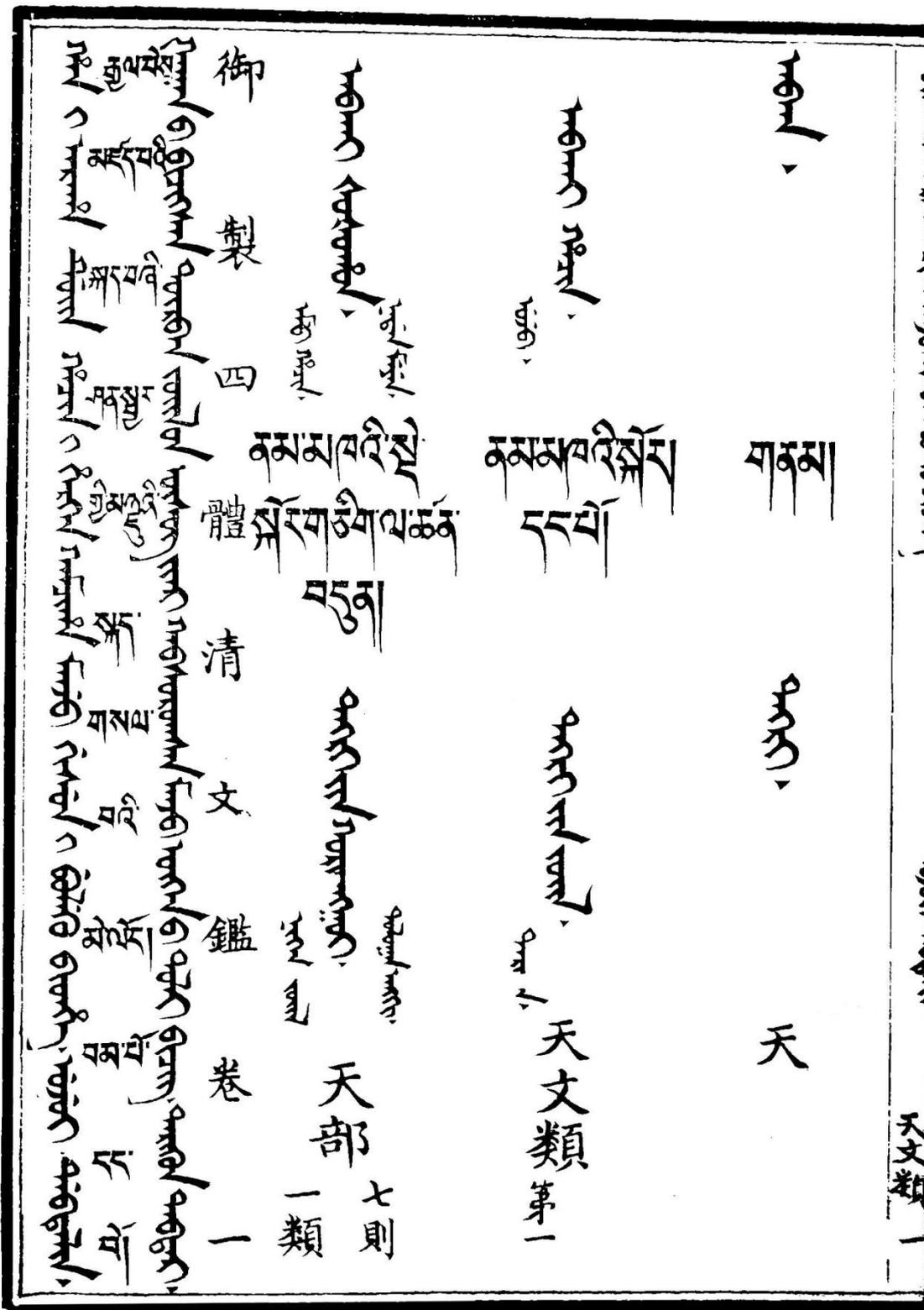
·《御制四体清文鉴》（微胶卷版），“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雄松堂，1966.

其中第 12 卷前 40 页左右的部分版面有墨痕，特别是蒙古语的部分很难辨认。

七、《御制五体清文鉴》

本清文鉴是满语、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汉语五种语言对照词典。由目录、正文正编 32 卷，补编 4 卷组成，未附序、凡例、总纲。第一部到第六部清文鉴均是木刻印刷本，只有该清文鉴是抄本。编写、制作年代不详。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sunja hacin i hergen kamci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皇帝所写包含 5 种文字的满语词典）”，蒙古文书名为“qayan-u biči-gsen tabun jüil-ün üsüg-iyer qabsur=u=γsan manju ügen-ü toli bičig”。词条总数为 18671 条目，分类体系与《增订清文鉴》及《四体清文鉴》相同，共设 36 部 292 类。

图8. 《御制四体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1页正面



“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微胶卷、雄松堂、1966）

本清文鉴按照满语、藏语译文、蒙古语译文、维吾尔语译文、汉语译文的顺序排列成一行，这样“1 项 1 行”的书写体例与《四体清文鉴》相同，但藏语和维吾尔语附加了以满文字母转写的标记，其中藏语附有书面语和口语两种发音信息（参照图 9）。

根据今西（1966:160-161），《御制五体清文鉴》的抄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 2 本，大英博物馆收藏有 1 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本中一本是原本由奉天故宫收藏的，今西先生称为北京本和奉天本，大英博物馆的收藏本称为伦敦本。

奉天本和北京本的影印资料，分别公开出版了以下内容。

- 《御制五体清文鉴》，东洋文库复制本，1937（注 19）。
- 《五体清文鉴（上册、中册、下册）》，民族出版社，1957（1998 再版）。

前者是日本京都大学收藏的奉天本影印原版的复制版本，正如今西（1966:160-161）指出，其中缺页、错页较多。图 9 是该书正文第 1 卷第 1 页反面的影印。

另外，《五体清文鉴译解（上、下卷）》（田村实造、今西春秋、佐藤长合编，京都大学文学部内陆亚洲研究所、1966）也可称为《五体清文鉴》的增补文本版。该书由上下两卷组成，上卷基于奉天本，翻印了《五体清文鉴》中所收录 18671 条目的满语、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的罗马字转写和汉语，并附上了满语的日文注解，按照原文的分类顺序进行了排列。下卷（总索引）是五种语言各自的所有项目索引（罗马字转写按字母顺序排列，附上了汉语笔画顺序的检字表）。另外，上卷的卷末附有今西春秋氏的《五体清文鉴解题》，今西（1966）将其作为论文已公开发表。

如上所述，该书在利用《五体清文鉴》时获得了极大的便利，但蒙古语的罗马字转写采用了独特的方式，利用时必须注意。该书中蒙古语的罗马字转写形式是“满文字母的标音”，即根据满文字母标记的蒙古语语音进行的罗马字转写。但是，如图 9 所示，《御制五体清文鉴》中未包含“满文字母的标音”，而是《三合便览》中所载以及日本京都大学收藏的《御制四体清文鉴》中朱笔书写的部分（该书《凡例》：xiii）。《三合便览》中收录的满文字母标记的蒙古语与附有乾隆八年（1743 年）序文的“满蒙合璧清文鉴”以及附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序文的《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中蒙古语的满文字母标记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在《五体清文鉴译解》中以下蒙古语的标记与本文的第三部分（7）中蒙古语的满文字母标记相同（注 20）：

hajao“旁”（943）、neomui“流荡”（7863）、jeo“针”（11612）、nisu nimui“擤鼻涕”（5022）、cadu“那边”（956）、togo“锅”（12882）、bum“块”（598）、alcor“手巾”（7472）、hūtaga“小刀”（4033）、nuru“腰”（4904）、jutkumui“拘泥”（9472）等。

因此，利用该书的蒙古语罗马字转写形式时，需要注意《五体清文鉴》中不存在的“满文字母的标音”以及满文字母标记的性质和限制。

本清文鉴是在 18 世纪编写的各种清文鉴中，收录语言和词汇（主词条）最多的清文鉴，是集大成者。本清文鉴作为蒙古语资料的价值，也在于词汇的丰富性和对照语言的多样性。但是，蒙古语的主词条几乎全部继承了先前清文鉴中的词汇，而且作为抄本，需要谨慎利用。

作为抄本，有必要与已有的 3 种异本进行校对、校订。今西（1966:160-161）指出，关于满语，北京本相比奉天本错字错写较多，蒙古语也可能存在同样的情况。例如，北京本（注 21）第 1 卷的 1648-1650 页（6219-6230）、第 2 卷的 1899-1901 页（7165-7171）、1908-1913 页（7200-7220）、3006-3009 页（11310-11322）中满语、汉语等其他语言的蒙古语译文存在不一致现象，似乎在抄写时错误地排列了页面顺序和词条顺序。奉天本不存在类似误写情况，但是东洋文库复制本（1937）存在如上所述的错页、缺页的现象较多。有待进行三种抄本的比较和校订。

注释：

本文于 2007 年 6 月 9 日在日本新潟产业大学举行的第 14 届蒙古学术交流会上的同名特别讲稿，以及同年 10 月 24-26 日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Mongolian Language: Problem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上的英文发表内容为基础进行了加笔修正。

1. 满文的罗马字转写采用 Müllendorff（1892）方式。
2. “维吾尔语”指在这个时代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突厥语系语言。江（1969）称为“察合台突厥语”、庄垣内（1979）称为“新维吾尔语”。
3. 此外，冠以“清文鉴”之名的满文辞书中，附有雍正十三年（1735 年）序文的《音汉清文鉴》、附有乾隆十一年（1746 年）序文的《一学三贯清文鉴》、有《御制兼汉清文鉴》等，均不包含蒙古文，因此不在本文考察范围。
4. 今西（1966: 130-133）称为“满蒙合璧清文鉴”，江桥（2001: 159-160）称为“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或“御制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春花（2006: 594）称为“清文合蒙古鉴”。春花（2006: 594）还提到“御制满蒙文鉴”“蒙古字合刻清文鉴”“清文鉴”等名称。
5. 蒙古语的罗马字转写采用的是在 Poppe（1954）的基础上做了若干变更的栗林均、呼日勒巴特尔（2006:4-5）的转写方式。
6. 卢秀丽、阎向东（2002: 104-105）称“御制清文鉴二十卷”为“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武英殿刻本 三十册 毛装 满蒙合璧本”。这里“三十册”指，正文 20 册、总纲 8 册之外，还将御制序和目录作为 1 册、后序作为 1 册。
7. 在别的类中有同样的词成为主词条的例子，主词条的数量不应等同于词语的数量。据笔者考察，在 12110 个主词条中，不同的词有 10849 条目。
8. “古典式蒙古书面语(Classical Written Mongolian)”或“古典式蒙古语(Classical Mongolian)”主要是指 17 世纪到 18 世纪的藏语佛典翻译成蒙古语，出版木刻版时规范的书面语。据 Grønbech and Krueger（1955: 5），这是根据 1720 年《甘珠尔》北京木刻版本的修订最终成形，它至今为止仍然是书面语的规范。
9. 在本稿中，考虑到便于印刷，将蒙古文逆时针旋转 90 度进行标记。另外，像<č> <j>用括号（< >）括起来的是表示“字母”。
10. 下面的例子按照“卷数、页数、正反(ab)、行数”的顺序以阿拉伯数字和字母(ab)记录了出现位置，在卷数后设置了连字符。例如：“14-73b8”表示“第 14 卷 73 页反面的第 8 行”。

11. 附有康熙五十六年序文的满蒙清文鉴和本清文鉴很难区分，只能按照出版年份区别，或按蒙古语的“满文字母表记”来区分。
12. 本清文鉴的影印本《御制满蒙文鉴》（海南出版社，2001）两本书中没有索引。另外，根据卢秀丽、阎向东（2002：106-107），关于“御制满蒙文鉴二十卷”有“清乾隆八年（1743年）武英殿刻本 二十八册 毛装 满蒙合璧本 50234 八册 存《总纲》八卷”，但是由于检索号码（50234）不同，已作为其他保管单位。
13. 在满语中，元音字母连续书写的情况下，第二个元音字母仅限于“i、o”。因此，连续书写的同一元音字母只有“ii”或“oo”。
14. 在此，只限于描述以满文字母标记蒙古语时元音的对应概况，详细内容在其他文稿中进行论述。
15. 呼日勒巴特尔（2005），主要根据《三合便览》，与蒙古文书面语进行了比较，同时归纳了蒙古语的满文字母标记中出现的格助词附加成分。标记方法几乎相同。
16. 与东洋文库所藏书相同。东洋文库所藏本中的缺页更多（栗林均、呼日勒巴特尔，2006：633）。
17. 栗林均、呼日勒巴特尔（2006：v-xi）。
18. 今西（1966：156）认为《四体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的词汇只有3个条目存在差异，但实际上4个条目存在差异。括号内是对应的汉语和蒙古语。
19. 复制本上没有出版年代的记载。出版年代参考了Poppe, Hurvitz, Okada（1964：165）。
20. 括号内是《五体清文鉴译解》中项目的序号。关于“三合便览”请参阅今西（1966：151-156）。另外，关于《三合便览》中蒙古语的满文字母标记方法，请参阅呼日勒巴特尔（2006）。
21. 根据民族出版社（1957，1998再版），括号内的数字为项目的序号。

参考文献：（按照中文、蒙文、日文、英文的顺序）

- 春花 2006 清代满蒙文“分类词典”的发展演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故宫博物馆。
- 春花 2007 《御制清文鉴》类目体系来源考，《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
- 古文义、马宏武、冯迎福 1990 《御制五体清文鉴 汉藏文鉴专辑》，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
- 呼日勒巴特尔 2004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蒙古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
- 呼日勒巴特尔 2005 用满文表写蒙古语格附加成分简述，《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
- 呼日勒巴特尔 2006 满文标写蒙古语的特点，《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
- 黄明信 1957 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材料，《五体清文鉴》（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
- 江桥 2001 《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 卢秀丽、阎向东 2002 《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 内蒙古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 1977 《二十一卷本辞典》，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石橋崇雄 1989 『『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御製清文鑑)』考一特にその語彙解釈中の出典をめぐって一』, 国士館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国士館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紀要 別冊』第1号、67-87頁。
- 今西春秋 1966 「清文鑑一単体から5体まで」, 朝鮮学会『朝鮮學報』第39・40輯、121-163+11-1頁。

- 栗林均、呼日勒巴特尔 2006『「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モンゴル語配列対照語彙』、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 江実 1969「満州語、蒙古語、チャガタイ・チュルク語（回語）の語彙相関々係について —五体清文鑑を基礎にして—」, 日本言語学会『言語研究』第 54 号、49-62 頁。
- 庄垣内正弘 1979『「五体清文鑑」18 世紀新ウイグル語の性格について』, 日本言語学会『言語研究』第 75 号、31-53 頁。
- 田村實造、今西春秋、佐藤長 1966『五體清文鑑譯解（上・下巻）』, 京都大學文學部内陸アジア研究所。
- 中嶋幹起 1993～1999『電腦處理 御製増訂清文鑑（第 1～9 冊）』, 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中嶋幹起 1999『清代中国語 満洲語辞典』, 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Grønbech, Kaare and Krueger, John R . 1955 .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Literary) Mongolian*. Otto Harrassowitz.
- Müllendorff, P.G. von . 1892 . *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zed Texts*.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Poppe, Nicholas . 1954 . *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Otto Harrassowitz.
- Poppe, Nicholas, Hurvitz, Leon, Okada, Hidehiro. 1964 . *Catalogue of the Manchu-Mongol Section of the Toyo Bunko*. The Toyo Bunko &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haracteristics of Written Mongolian in Polyglot Manchu Dictionaries of the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Written by KURIBAYASHI Hitoshi¹ Translated by Aruhan²

- (1.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Tohoku University, Sendai 9808576, Japan;
2.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Qing Wen Jian(清文鑑)" means a "dictionary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the 18th century of the Qing Dynasty, a series of "Qing Wen Jian" wer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the name of the Emperor. Thus "Qing Wen Jian" contains several kinds of Manchu dictionaries, which cover different languages (e.g. Manchu, Mongolian, Chinese, Tibetan, Uigur), different numbers of entry words, and different ways of discrip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tures of main "Qing Wen Jia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n words contained in those Manchu dictionaries.

Keywords: 18th century; the Qing dynasty; Manchu dictionaries; Mongolian